

郁达夫： 悲剧性的时代作家

陈思和 王晓明 主编

[日]铃木正夫 著 李振声 译

广西教育出版社



YU DAFU:
BEIJUXING
DE
SHIDAI
ZUOJIA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责任编辑 李人凡 封面设计 刘相文 版式设计 鲍翰
责任校对 温泉源 孟宁



ISBN 7-5435-2996-3



9 787543 529960 >

ISBN 7-5435-2996-3/I • 248 定价:15.00 元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郁达夫：悲剧性的 时代作家

铃木正夫 著
李振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日)铃木正夫著;李振声译.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5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第一辑)

ISBN 7-5435-2996-3

I. 郁... II. ①铃... ②李...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生平事迹 ②郁达夫(1896~1945)-学术思想-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683 号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

(日)铃木正夫 著

李振声 译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6.375 印张 162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ISBN 7-5435-2996-3/I·248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又一轮世纪交替之际,当代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的研究,日益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20年来,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内的学术领域是比较活跃、成果也比较显著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国际汉学领域内也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所以,研究和总结20世纪文学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梳理20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在今天的特殊环境下,具有继往开来、启示新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

“现代”,是一个区别于“古代”的学术概念,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后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呈现的一个整体性的标记。就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看,其由胚胎期向成熟期的转型标志,正是以提倡现代汉语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相关的文学革命。将以现代汉语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即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学”,它包括了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庞大体系。自然,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也在其列。所以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传统概念转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以后,为了更好地沟通20世纪与21世纪文学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重新确认和界定“现代文学”的定义,“中国现代文学”不再是过去界定的“1917—1949年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而是超越了具体年限,并以现代汉语的确立为开端的跨世纪

文学。本丛书将“现代”冠于“中国文学研究”之前,就是表明了我们对现代学学科建设的一点看法。

在世纪末钟声撞响前夕,世界上处处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处处有宏大的理想巨构。但我们策划本丛书的宗旨则很平凡,也很渺小,我们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热爱从事了十几年的研究专业,所以诚心诚意地想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本丛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国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自由而切实的思想学术园地。我们称之为“书系”,是打算推出一套研究系列,它包括:甲种,新著新论,推荐出版用中文写作的专题研究著作和论集;乙种,域外新译,精选海外汉学家所著的优秀的专题研究论著,约请合适人员译成中文出版;丙种,史料新知,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发现和整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想能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努力,使这一学术园地得以不断发展。

陈思和 王晓明

1999年11月于上海

遥想达夫之死^①

（代序）

顾振涛

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中读到这样的字句：抗战以后，郁达夫流亡到南洋一带，直至抗战胜利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达夫的死颇有些突然和神秘，但似乎又在意料之中。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同时又是亲眼目睹了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中国作家，所以日本宪兵置其于死地的事实也并非不可想象之事。达夫之死激起了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愤怒，同时也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文人传统中以身殉国的一个现代例证。

定论早就有了，但定论并不足以消除一位日本学者心头的疑虑。与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心仪达夫的热心读者，而与我们不一样的是，“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的说法让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无论如何，“日本宪兵”毕竟是他的同胞。可感情归感情，作为一名学者，他深知要推翻这种说法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理智出发，找到确凿的证据，加以证伪。于是，在这种心愿的促动下，我们今天有幸拜读到《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他的作者就是日本郁达夫研究专家铃木正夫先生。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铃木先生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访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关涉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且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文字材料。由于一个极为偶然的的机会，铃木先生找到了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凶手之一 Y 的妹妹，继而通过她又找到了当年直接下令的原日本宪兵班长 D，由此，“郁达夫为日

① 编者注：本文原为《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的书评。

本宪兵秘密杀害”的说法才得到真正有力的证据而盖棺论定。在此之前,胡愈之等人只是猜测而已。另外,郁达夫的被害日期也得以查实,为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之后的当夜或次日凌晨。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所记之日期为9月17日,则与其后不久发生在苏岛的另一件事缠夹在了一起,比实际情形晚了近二十天。

设想一下当时铃木先生的感受吧。先前一心一意想证伪的说法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被推翻,反由于自己不懈的努力被意外地证实了。理智与感情在这里又撞到了一块儿,而铃木先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非但没有隐瞒这一真相(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保持缄默),反而是勇敢地向世人公开了这一切。如他在前言中写的那样:“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

日本学者的这种重事实胜于感情、处处求实、不放过一丝一毫可疑之处的实证精神不仅反映在达夫之死这一焦点问题上,同时还渗透于全书的其他各章。事实上,讨论达夫之死真相的文字只是集中于全书的最后两章,前面九章着重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郁达夫流亡于苏门答腊的经历。其中,作者寻访和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和知情者,譬如第七章“日本人眼中的赵廉(郁达夫的化名)”便是作为当事人的日本人对郁达夫的印象和感受的实录。即便是中国方面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铃木先生也并不轻易依从,他总是想方设法力求第一手的资料或其他相关材料作辅证。相比于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王任叔的《记郁达夫》,铃木先生的叙述显然更注重客观性。胡、王两位先生都是当事人,曾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一些事情,这当然是身为局外人的铃木先生无法比拟的,因而,他们的叙述带有或淡或浓的感情色彩和文学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即注重细节描绘,有所节制的适度想象等等。如果说胡、王两位先生沿袭了《史记》的遗风,尚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界,那么,铃木先生的文字可谓是惜墨如金,力排任何主观因素的介入。不妨略举一例:郁达夫被害之后,其在苏门答腊的妻子次日凌晨为

其生养了一个女儿。一死一生，对比是这样的强烈，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有血肉的人都忍不住会为之动容的一个场景。铃木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铃木先生对此并未多作评论，只是简单地如实记载：“在他（郁达夫）失踪后几小时，女儿降生。”也许铃木先生认为在这样惨烈的事情面前，任何评论都是不恰当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著者在前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动机：“本书是对郁达夫由新加坡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如果这是惟一的目的，我想铃木先生有理由在类似这样可能失去感情控制的关口保持沉默。他又写道：“另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很明显，铃木先生并不想使自己的工作仅仅停留在汇总资料、解释事实的层面之上，他还试图经由郁达夫进而探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特定处世方式和历史心态。然而，通观全书，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引述，以及日军占领下的苏门答腊的情况，鲜见的是作者的主观评述。我们所能了解的似乎只是郁达夫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公开行动报告，而很少能从作者的叙述中直接得到有关郁达夫心态的分析，评论，乃至猜测。达夫遇害可以说是整个事情的高潮，铃木先生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对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生活作一非史实性的评述，但他有意识地避开了这一契机。当然，这种竭力再现历史真实图景的愿望无可厚非，但任何所谓的“历史真实”无非只是从某种眼光、某种角度、某种观点出发的“某种历史真实”，我们根本无法排除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真实”的干扰和侵犯。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揭示了历史的某种虚妄。假使铃木先生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重新叙述的话，那这本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大概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吧？从这一层意义而言，我宁愿把此书看成是一部注重实证的考据性书籍，而不是一部小型的人物传记。

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期间所写的文字，留下来的极少。有幸保存下来的是一组作于“保东村”的十二首旧体诗——

《乱离杂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思恋离别的恋人(在新加坡结识)李晓音(有的写作李筱音,李小音)而作,诗歌用典适切,笔触含蓄,流畅,情绪颇多感伤。譬如有这样的诗句:“简札浮沉殷美使,泪痕斑驳谢庄衣。解忧纵有兰陵酒,浅醉何由梦洛妃。”此处的“洛妃”暗指李晓音,连用三个典故,通畅流转,不露痕迹,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凄婉之情。类似的诗作共有七首,可见达夫用情之深。不过,除了这种儿女情长的诗作以外,郁达夫也有像中国旧文人战死沙场的慷慨之作:“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辟?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郁达夫曾客居日本十年之久,可当两国交兵、反目为仇之时,身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感情还是中国式的悲壮。可惜连达夫自己也未料想到会死得如此悄无声息,竟无缘得见中国人民“会当立马扶桑顶”时的欢欣。就连信手拈来的赠别诗也写得极为出色:“十年久作贾胡游,残夜蛮荒迭梦秋。若问樽前惆怅事,故乡猿鹤动人愁。”隐隐有一股不平之气,雄浑沉郁,颇有放翁之遗风。郭沫若在《郁达夫诗词抄》的序里讲,郁达夫的旧体诗实际上比他的小说还要出色。郭一生说过不少不负责任的话,所以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后期,他的话可以不必太当回事,但这里对郁达夫创作文学成就的评论,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其实,郁达夫对旧体诗一直情有独钟。他在谈到19世纪的德国诗人施笃姆时曾说:“他的无数的短篇小说,是他的抒情诗的延长的作品。”这话移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贴切。相比他结构不免松散,文字不免平白,感情不免直露的小说而言,他的旧体诗似乎显得更为紧凑、含蓄而典雅。

长久以来,我们之所以只把郁达夫当作一个小说家和散文家来看待,而没有注意到他还是个敏感的诗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和散文激起的反响殊为强烈,他所处的时代更注重白话作品,而且还由于我们一起没能走进达夫真正的性格堂奥。达夫的一生好似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潦倒漂浮,这与他与生俱来的敏感而冲动的诗人气质有关。就在日军占领下的苏门答腊他所经历的一切也足可证明这

一点。他生性冲动，不免张扬，从而导致身份泄露，直至最终惨死敌手，可他也会办酒厂、做生意以避敌人的耳目；他性喜放浪，嗜酒如命，但在与日本宪兵周旋时又能克制有加，滴酒不沾；他一生浪漫，刚与王映霞分手，就与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的李晓音过从甚密，可他也知道明哲保身，娶个当地妇女做掩护。总之，他是个典型的诗人，夹杂着中国旧有传统的感伤气质和西方浪漫激扬的因子，率性而为，豪爽热情，有时又不免扬才露己，所以他的一生中会有那样多欢乐和悲伤的故事，分分合合的患难朋友，以及世人对他的种种误解、指责和憎弃。面对这一切，郁达夫偶尔像个孩子似的发些牢骚，从不记仇，因为他实在是个善良的人。可也是这善良促发了他轻信的一面，而这“轻信”也许正是导致他惨死的直接原因。据书中有关日本当事人对郁达夫的回忆文字来看，郁达夫与他们的关系甚是良好，这不仅与当时的处境有关，而且也因为郁达夫从来就不曾把单个、具体的日本人，甚至是日本宪兵视作洪水猛兽。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自己最后还是死在日本宪兵的屠刀之下。可以说，郁达夫的悲剧正是其矛盾性格的悲剧，或许也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诗人的悲剧。

前不久，电视台播送了这样一则新闻：意大利某法院将重新审理一个曾因时间过长而在法律上失效的原纳粹军官的罪行，之所以把这个因此而被释放的凶手重新推上法庭是因为众怒难平。我深感于犹太人复仇情绪的强烈，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奉行中庸之道的礼仪之邦即便有过这样尖锐的情感，也早被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给消灭殆尽了。当然，这两种或激烈或平和的态度没有优劣之分，这只不过是不同民族的不同心态罢了。我也无意仿效犹太人不惩凶手誓不罢休的做法，执拗地要求重新审判任何罪人，这于其本人，于我们自身，于双方，甚至于九泉之下的冤魂都未必有什么意义。我想询问的是：为什么执行命令的直接凶手因不堪忍受这血腥的事件而逃离了宪兵队，而D却能泰然处之达四十年之久？要是铃木先生没有那张迫使D就范的“复印件”，是不是这事就石沉大海了？当年下达命

令的原宪兵 D 杀害郁达夫的直接动机是什么？郁达夫的存在对 D 是否构成了直接的致命威胁？铃木先生的著作中没有追问这些问题，或许这已远离了铃木先生写作此书的初衷，或许这些问题的回答已不可能。但我想指出的是：重新审视和反省我们人类在迫人疯狂的环境下的特殊心态是历史本身遗留给我们的使命，这不仅是 D 个人的事，也是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事，它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存在于人类心灵中猥琐和卑劣的一面，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因此，从这一层意义而言，达夫之死不只是个人事件，同时它也是一桩历史事件。对我们而言，需要的远不只是某种暧昧的慰藉，相反该是对历史深切的反思才是。

目 录

遥想达夫之死(代序)·····	顾振涛(1)
一 郁达夫——他的生涯与活动·····	(1)
二 脱离创造社前后·····	(13)
三 编《奔流》、《大众文艺》的时代 ——以与鲁迅的交往为中心·····	(48)
四 鲁迅的《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69)
五 郭沫若归国与郁达夫·····	(91)
六 晚年郁达夫 ——以新加坡时期为中心·····	(106)
七 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140)
八 有关陈仪的备忘录 ——兼及与鲁迅、许寿裳、郁达夫的关系·····	(157)
译跋·····	李振声(188)

一 郁 达 夫

——他的生涯与活动

我若是步武郁的后尘去研究中国人的话,那恐怕是不会成功的。郁和日本人如此的相似。

这是在上海和郁达夫过往甚密的金子光晴评述郁达夫的话(《郁的事情》)。读一读郁达夫写于1936年《日本的文化生活》的话,就会明白这位中国作家是如何精深地理解日本并且喜爱着日本的,即使太平洋战争中,避难苏门答腊期间,据说他还屡屡说起,“我是了解日本人的,日本人本质上并不坏”(《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郁达夫的作品在战前就由作家小田岳夫等人翻译到了日本,知道其名的人不在少数,还有特别偏爱他的读者,因为郁达夫的风格特别容易让日本人觉得亲近。然而,就在日本战败后不久,他却在远离故国的地处赤道的僻远之境,遭到日本宪兵的暗中杀害。这个与日本关系如此之深的中国作家,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对日本人说来,是件永远无法遗忘的痛心悔恨之事和一笔欠债。战后已近半个世纪,不单单是他的死,就是对战争本身的记忆,也很容易随时间的推移而淡薄了。我打算重新寻索一下这位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的悲剧性作家的生涯概略。

郁达夫(字达夫,名文),1896年,约清朝灭亡前十五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一个小地主家庭,为第三子。富阳位于富春江之滨,从杭州沿因钱塘潮而闻名的钱塘江上溯约五十公里(钱塘江在这一带更名为富春江),是一处风光秀丽的地方。郁达夫常喜欢在他的作品里写到这个故乡。他的文学所擅长的抒情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故乡的风土培

育而成。

幼年丧父，随母亲一道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日子。长兄曼陀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乡，也是留日学生出身，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后任司法官，颇为出头露面。曼陀常常作诗作画，留学日本时，曾与森槐南等有过交往，是个有着文人气质的人物，因而对郁达夫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郁达夫是个早熟的才子，九岁时赋诗，就让周围的人惊奇不已。在富阳开设的、里边杂有成人的新式学堂里，他也是一跃而崭露头角的。据他1934~1935年发表的自传，与郭沫若一样，也富有反抗心，跟学校生活合不来，结果没在中国完成正规中学教育，就于1913年随奉命考察日本司法制度的长兄赴日，翌年进一高校特设预科，在这里和郭沫若成了同班同学。1915年考入名古屋第八高校^①理科，一年后转入文科。他在后来的岁月中自己回忆说，高校的四年里，光读完的外国小说，就有二千多本。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时就开始写作旧体诗，向报社投稿，读高校时也向当地报纸的汉诗栏投稿，并由这层关系而结识了著名的汉诗诗人服部担风，诗艺也因此大有长进。服部还是后来因南京事件被追究责任而判死刑的松井石根的汉诗导师。说起来，1936年3月，郁达夫作为福建省政府参事，在福州和师出同门的松井会见时，恐怕对师出同门一事还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拙稿曾有所论及（《读白桦〈松井石根现象——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杂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二号，1988年12月）。郁达夫一生中留下了将近六百首的旧体诗，在文学成就上，比起他的小说来，有人更为推重他的旧体诗。但不知何故，郁达夫几乎没有写过新诗。

1919年，进入该年由法学部经济学科独立出来的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习。郁达夫自称，大学时代他仍专心致志地耽读着小说。不过，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当时的东大经济学部由一批青年教师主持着局面，充满了清新之气（参见本书《脱离创造社前后》注⑤），并且还说过，将来打算写一本

① 译者按：日本的高校，即中国的高中。

中国货币史。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看到,作为一种近代科学,并且尤其又是很值得一读的经济学,与他后来的活动还是有关联的。顺便说一下,早在1923年5月,郁达夫就写下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这篇很激进的评论,对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写道:在中国文艺界,第一次使用“阶级斗争”这一名词的,大概要推郁达夫了(郭沫若所写的那篇也被称作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的转向宣言的《革命与文学》,是1926年4月的事)。

耽读小说的结果,便是用日文练习写小说,并经由正在东京高师就读的田汉的介绍,走访了新锐作家佐藤春夫,后来郁达夫还将佐藤尊为自己文学上的老师。到1921年6月,跟郭沫若等一批留日学生一起结成创造社,筹划纯文学杂志《创造》的发行。初期创造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以浪漫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方法。

翌年五月,《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行,而在这之前,即1921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已经出版。这本小说集中收入中篇小说《沉沦》和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均属自传性小说,其中《沉沦》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郁达夫写这篇小说时,显然注意到了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他把它当作了自己写作《沉沦》的范例,但《沉沦》是和《田园的忧郁》性质有所不同的作品(参见本书《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一章)。

《沉沦》对性的公然描写和展示,这一点在封建道德束缚十分严厉的中国遭到了强烈的非难,被称作是诲淫的、不道德的书,无人能够接受。身陷窘境的郁达夫,将这本书送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请他评论。周作人还是比创造社早半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现代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且倡导人道主义文学。周作人将所谓不道德的书作了分类说明,进而认为《沉沦》“有猥褻的因素,但并没有特别不道德的性质”,“《沉沦》是艺术作品,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不是一般人的读物”,从而加以卫护。由于周作人的这番评论,《沉沦》

的评价得以确定。《沉沦》成了郁达夫的成名之作，他的作家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从那以后，郁达夫一直对周作人十分敬重。周作人日后滞留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并对傀儡政权作出协作的姿态，这对郁达夫来说是件预想不到的事。他把这种心情写进了《“文人”》等文章里。

周作人的文章里提到了郁达夫说过的话：“不曾在日本呆过的人，是理解不了这本书的真价值的，对文艺没有真挚态度的人，是没有资格批评这本书的。”（周作人《沉沦》）那个时代，留学于已跻身列强行列的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被蔑称为“支那人”、被歧视的情景，在嗣后别的留学生出身的作家作品中，也常常可以读到。《沉沦》中写道：“固然，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就跟我们轻视猪和狗一样。”《沉沦》是一部第一次让有着相同经历的青年人产生共鸣的作品。那位留学生主人公决心自杀后最终喊出的话，如今已经成了经常被引用的非常有名的话：“祖国哟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子在那里受苦呢！”在对性毫不掩饰加以表现的基础上，进而呼吁祖国的富强，这一点，正是这部艺术上还很粗糙的作品，却在日后得到很高评价，并当作中国现代文学里程碑性作品的原因之所在。

1922年春，郁达夫东大毕业，进文学部语言学科学习本科课程，7月回国，投身于真正的作家活动，但因为当时是现代文坛得以确立之前，因而说起来，他不过是过着一种身兼杂志编辑和教师两种职业的生活（鲁迅在上海靠一支笔生活是始于1927年的事）。

不仅仅是郁达夫，对在现代文学上起步迟晚的中国作家说来，在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向外国文学寻求范型，那是不足为怪的事。郁达夫在日本首先借鉴的是佐藤春夫。由于这段留学时期，正好也是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私小说衍生的时期，因而他也汲取了私小说的手法。

他将法朗士所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视为不刊之论，自传体、私小说式的作品自然占了他作品中的很大部分。他的作品之所以在日本也颇受欢迎，除了气质上和日本人有相近之处外，恐怕还得益于这种创作手法的采用。